

國語辨名

張以仁

一

國語，又名春秋國語。又名春秋外傳，或簡稱外傳。或贊稱春秋外傳國語。有時也被稱作春秋傳。但那即使不是一種錯誤的稱謂，也是不尋常的。

「國語」一名，最早見於何時呢？晉書列傳二十一東晉傳說：

初，太康二年，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，或言安釐王冢。得竹書數十車。…
國語三篇，言楚、晉事。……

不準盜墓所得，可能原題有「國語」字樣。也可能是時人（晉人）的題記。若那三篇文字與時傳國語相同，則原無題名而時人命之爲「國語」也是很自然的事。不過，從東晉傳下文看來，多半是原來的題記。東晉傳下文說：

名三篇，似禮記，又似爾雅、論語。師春一篇（註一），書左傳諸卜筮。「師春」似是造書者姓名也。瑣語十一篇……梁丘藏一篇……繳書二篇……生封一篇……大曆二篇……太凡七十五篇（註二），七篇簡書折壞，不識名題。……

只有七篇因爲簡書折壞，才不識名題。可見原書都有名題。而「名」，「師春」，「瑣語」，「梁丘藏」……等都是罕覩的書。因此也不可能時人的題記。如此說來，則「國語」之名，最晚也是魏安釐王卒時（公元前二四三年）便有。往後，到了史記裡，這個名字便隨同作者之名一起出現了。史記太史公自序說：

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。（又見報任少卿書）。

而史記之文出於國語者更是比比皆是（參拙著國語與左傳的關係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

註一：張心澂讀爲「論語師春一篇」，列論甚豐。見所著偽書通考「師春」條。惟張氏所謂「名學之書，與論語決無相似之處」，似僅就內容言。疑東晉傳所記乃就其形式言。則讀「又似爾雅、論語」爲句，亦無不可。因仍從舊讀。

註二：據東晉傳載，紀年十三篇，易經二篇，易緯陰陽卦二篇，卦下易經一篇、公孫段二篇，國語三篇，名三篇、瑣語十一篇、梁丘藏一篇、繳書二篇、生封一篇、大曆二篇、穆天子傳五篇、西王母圖詩一篇、雜書十九篇、另加不識名題者七篇，共七十六篇而非七十五篇。

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）。

史記裡面，還沒有「外傳」的名稱。以「春秋外傳」名國語，是比較晚出的事。王充的論衡雖然開始有了這種說法，如卷二十九案書篇說：

國語，左氏之外傳也。

但這裡的「外傳」，顯然只是泛稱而不是專名。到班固的漢書才「國語」「外傳」二名並出。漢書藝文志有「國語二十一篇」，附春秋之後。司馬遷傳有「司馬遷據左氏、國語，采世本、國策」的說法。而律歷志則已有「春秋外傳」之稱。律歷志下說：

春秋外傳曰：「少昊之衰，九黎亂德。顓頊受之。乃命重、黎……」（文見國語楚語下）。

賈逵似乎也用了外傳之名。史記吳世家集解說：「駟案：賈逵曰：外傳曰：吳先歎，晉亞之……」。班、賈二人俱是東漢初期人物，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：「案國語二十一篇……漢書律歷志始稱春秋外傳」。清崔東壁先生也說：「東漢之儒，遂題之曰春秋外傳。」（見洙泗考信錄卷三「國語非左氏作」條）。日本學者諸橋轍次漢和辭典謂「魏、晉以後，始用外傳之稱。」（註三），顯然是不對的。

班、賈之後，鄭玄（註四）、劉熙（註五）、杜預（註六）、王肅（註七）、韋昭（註八）諸人，均已屢用「外傳」之名，不再贅述。不過，有一點却要在這裡順筆一提，那便是後漢楊終也著有春秋外傳十二篇。見後漢書楊終傳。與這裡所說的國語無關。隋書經籍志沒有提到他這部書，大概沒有傳下來。

「春秋國語」之名，雖然史記已有，而且不止一見。如五帝本紀所載：

予觀春秋、國語，其發明五帝德、帝繫姓章矣。

又十二諸侯年表：

於是譜十二諸侯，自共和訖孔子，表見春秋、國語。

註三：見減和辭典卷三「國」字「國語」條下。原文爲：「魏晉以後外傳の稱を用ひた」。

註四：詩小雅皇皇者華鄭箋曰：「春秋外傳曰：懷和爲每懷也。」

註五：見釋名釋典藝。

註六：見左傳註。如昭公七年杜注云「外傳曰：朕夢協朕卜，襲於休祥，戎商必克。」

註七：見孔子家語序。大雅生民疏亦引王肅云：「外傳曰：精意以亨曰禋。」

註八：見國語解序。

但這兩處學者有把它分讀爲「春秋」「國語」而不四字連讀的。如康有爲便是。康氏在新學僞經考中說：

史記五帝本紀，十二諸侯年表皆云春秋、國語，蓋太史公僅採此二書，無左氏傳也。

國語與左傳是否原爲一書的問題我們姑且撇開不談（讀者如有興趣，可參拙著「論國語與左傳的關係」及「從文法、語彙的差異證國語、左傳二書非一人所作」二文，分載史語所集刊第三十三及三十四本），而對這四字的讀法，却不能不有所猶疑。我們知道，史記言「春秋」，有時候指的實是左傳。如歷書：「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，而春秋非之。」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說：「春秋，謂左傳也。公、穀並無此說。左傳文公元年云：『於是閏三月，非禮也。』……」又吳太伯世家：「余讀春秋古文，乃知中國之虞，與荆蠻句吳兄弟也。」考證說：「春秋古文，卽左氏春秋傳、劉歆與太常博士書、許慎說文序可證。」有時候又是指的公羊傳。如宋世家：「春秋譏宋之亂，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，國以不寧者十世。」索隱說：「按春秋公羊有此說。左氏則無譏焉。」因此史記的「春秋」，大概是包括春秋經及三傳而言。和國語沒有關係。我們再翻檢翻檢年表，更可看出若干有趣的事實。比如年表所記日蝕，凡二十二次，都與春秋合（註九）而不是國語所有。有的像隱公三年、宣公八年、十年、十七年、襄公十四年、十五年、二十年、二十一年、二十四年、昭公十五年、二十二年、定公五年、十五年等十三次日蝕記載，連左傳都沒有。又如有些災祥的記載，像地震，襄公十六年、昭公十九年、哀公三年等三次也只見於春秋而不見於國語或左傳。這些事實，都可證明年表的「春秋國語」很有分讀的可能性。據我的推測，「國語」而冠以「春秋」二字，其作用似乎在求別於其他「國語」，如漢書藝文志所載的「新國語」之類。因此，這個名稱我認爲應該是較爲晚出的。

史記之外，「春秋國語」一名，最早當出現在後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裡（也正是在新國語出現之後）。說文玉部「珠」字下說：

春秋國語曰：珠足以禦火災。

註九：只有昭公十年日蝕一次，經、傳皆無記載。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以爲「昭十年不日食，此外缺。」

國語辨名

又鳥部「鶯」字下也說：

春秋國語曰：周之興也，鸞鳴於岐山。

前一條見於國語楚語下，後一條見於周語上。說文裡面，也有逕稱「國語」的，如石部「磬」字下：

國語曰：肅慎氏貢楨矢石磬。

又言部「誒」字下：

國語曰：誒申胥（註十）

前一條見魯語下。後一條見吳語。很顯然「春秋國語」便是「國語」。有如「春秋左傳」便是「左傳」一樣。

只有隋書經籍志不嫌辭費，把兩種名稱揉在一起，稱為「春秋外傳國語」。隋志的名稱，當有所根據。經籍志說：

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賈逵註。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註。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。梁二十一卷。○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註。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晉五經博士孔晁註。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唐固註。

除了王肅章句外，其他賈、虞、韋、孔、唐諸家之書都稱「春秋外傳國語」。便是王肅之書，舊唐書經籍志也把它叫作「春秋外傳國語」，只是卷數為二十二卷而非一卷。是不是諸家原來命名如此，還是後人題記，則不得而知。如果是諸家自己命名，則這個名稱東漢初年已有。如果是後人題記，也不得晚於隋書經籍志（註十一）。至於爲

註十：今本國語「誒」作「訊」。王引之經義述聞以為「訊」乃「誒」之假字。許慎讀說文記、沈濤說文古本考以及段玉裁說文註則以爲「訊」乃「誒」之誤書。其他學者討論者甚多。詳見拙著國語斠證一書。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註十一：後漢書賈逵傳說：「尤明左氏傳、國語，爲之解詁五十一篇。」三國志賈逵傳則未及此事。三國志虞翻傳只說：「又爲老子、論語、國語訓註，皆傳於世。」唐固傳只說：「著國語、公羊、穀梁傳註」。韋昭傳則未及國語之事。魏書王肅傳只說：「乃作周易、春秋例，毛詩、禮記、春秋三傳、國語、雅爾諸註。」孔晁傳史無傳。又韋昭國語解序說到鄭衆曾爲國語訓註。然查後漢書鄭衆傳，也沒有說到註國語的事。隋志以次，也沒有載錄他的書名。大概早已亡佚了。諸傳所及，都沒有「春秋外傳國語」字樣。又新唐書藝文志雖有「左丘明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」字樣，然於王肅書但稱「國語章句」，唐、虞、韋等書但稱「註國語」或「誒」。孔晁書則稱「解」。到宋史藝文志，則諸書多已亡佚，僅存韋註。題爲「左丘明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」。可見「春秋外傳國語」一名，是不是原來註家的命名，實在很成問題。

什麼要叫作「春秋外傳國語」？是不是想有別於楊終的春秋外傳？或是有別於其他「國語」？則不得而知。後來舊唐書經籍志、新唐書藝文志、宋史藝文志等都援用這個名稱。諸橋漢和辭典只出宋史一處，未免疏漏。

也有人把國語稱爲「春秋傳」。晚於班固約六十年的鄭玄便如此。這是很特別的現象。在周禮、儀禮及禮記等書的鄭氏注內，可以看到這些例子：

周禮節服氏注「春秋傳曰：晉祀夏郊，董伯爲尸。」（賈公彥疏曰：「引春秋傳者，是外傳晉語。」）

儀禮大射儀注：「春秋傳曰：大族，所以金奏，贊陽出滯；姑洗，所以脩絜百物，考神納賓。」（賈公彥疏曰：「云春秋傳者，是外傳伶州鳩對周景王辭。」）

又：「春秋傳曰：夷則，所以詠歌九則，平民無忘；無射，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，示民軌義……」（賈公彥疏曰：「言春秋傳者，亦是外傳文。」）

禮記檀弓下注：「春秋傳說巫曰：在女曰巫，在男曰覩。」（孔穎達疏曰：「所引春秋傳者，外傳楚語。」）

禮記祭義注：「春秋傳曰：屈到嗜芰。」（孔穎達疏曰：「楚語……」）

我們對這種現象，可以有幾種解釋：一、鄭玄以爲左傳、國語都傳春秋，凡傳春秋的他都叫作春秋傳。二、內外傳所記載的事大都類似，也許鄭玄因此一時誤繆，把國語的文章，誤記成左傳的。三、這些文字也許就是左傳的逸文，（鄭玄當時，尙未逸失。）因爲左、國文字相同者多。四、當時國語與左傳尙是同一部書，如康有爲所說的（註十二）。既是同一部書，鄭玄把它稱爲春秋傳便不希奇了。對於這些解釋，三、四兩種可能性較小。因爲出現的次數既不只一次，逸失的可能便相對地減少。而如楚語觀射父答昭公問及屈到嗜芰二事，左傳根本沒有記載。根據前人的校刊經驗，文句很少會整段整節地佚失的。因此第三項解釋是不大可能的。康有爲以爲左傳、國語原爲一書而名之曰「國語」，並不叫「春秋傳」。根據我的研究，這兩部書在內容、風格、文法以及語彙上都有很大的差異，根本不可能是從同一部書化分出來的。（參拙著「論國語與左傳的關係」及「從文法語彙的差異證國語、左傳二書非一人所作」

註十二：見康有爲著新學偽經考。

國語辨名

二文)。所以第四項解釋也不可能。比較起來說，一、二兩項解釋較為可能。鄭玄曾稱國語為「春秋外傳」(詩小雅皇皇者華箋)，鄭注三禮及箋詩引左傳又都稱為「春秋傳」，引公羊傳也稱「春秋傳」(註十三)可知鄭玄把凡是傳春秋的都稱為「春秋傳」。不過，周禮、禮記鄭注引國語凡三十餘次，多數稱為「國語」或「×語」(如「周語」「魯語」之類)(註十四)。稱「春秋傳」的畢竟是極少數。左傳、國語所記之事大都相類，或許鄭玄一時謬誤也不一定。

除了鄭玄以外，許慎的說文解字也有這樣情形，卷十一火部「焞」字說：

明也，從火享聲。春秋傳曰：焞燭天地。

國語裡面並沒有「焞燭天地」的話。說文學者都認為是鄭語「以淳燭敦大天明地德」的約文。對於「春秋傳」的問題，或以為是「春秋國語」之誤(註十五)，或以為「春秋傳曰」下刪脫「天策焞焞，國語曰」諸字(註十六)。我們先不必亟亟的來評議這兩種說法的是非，且針對這一問題詳細的檢查一下說文引書的現象。同樣的情形還有木部的「槎」字，說文說：

袤斫也。從木，差聲。春秋傳曰：山不槎。

說文學者都以為是國語魯語之文。除了徐鍇說文繫傳和段玉裁說文注外，各家都以為「春秋傳」是「春秋國語」之誤。繫傳以為是「公羊傳之言」。但今傳公羊傳根本沒有這樣的文字，所以我們可以不必管他。段注則謂「許書亦有謂國語為春秋傳者，此

註十三：如禮記曲禮上「兄弟弗與同席而坐，弗與同器而食」下鄭註說：「春秋傳曰：羣公子之舍則己卑矣。……」孔穎達疏說：「注春秋傳羣公子之舍則己卑矣，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。莊元年秋策王姬之館於外，公羊傳曰：『路寢則不可，小寢則嫌，羣公子之舍則己卑矣。』……」又如曲禮下「是職方」下鄭註說：「春秋傳曰：自陝以東周公主之，自陝以西召公主之，一相處乎內。……」孔疏說：「引公羊傳證周家二伯所主之事。隱五年公羊傳云：『天子三公者何？天子之相也。則何以三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，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，一相處乎內。』……」皆其例。

註十四：周禮鄭註引國語約二十餘次，除稱「春秋傳」者一次外，都稱「國語」。禮記鄭注引約十餘次，除兩稱「春秋傳」外，都稱「×語」。

註十五：如鉏樹玉說文解字校錄、嚴章福說文校義、段玉裁說文解字註、王筠說文句讀、吳玉搢說文引經考諸家是。

註十六：如苗夔說文繫傳校勘記、承培元說文引經證例諸家是。

其一也。」與他注「焞」字的說法雖不一致（註十七），但我們還是承認這是一項新的意見。這兩個例子以外，還有一些例子如立部的「蹲」、心部的「忼」，都有類似問題。不過那些例子各有瑕疵（註十八），不如上述二例完整，所以不擇舉出來並論。對於上面兩例所引起的解釋，可以歸納為三：一、「春秋傳」是「春秋國語」之誤。二、「春秋傳」下脫該傳傳文。三、許慎把左傳和國語都稱為「春秋傳」。但由於第二例的出現，脫文的可能性便大大的減少了。而一、三兩種解釋，與我前文對鄭注的則幾乎完全相同。我用「幾乎」二字，是因為有的學者以為是轉寫之誤（註十九）。就說文言，轉寫之誤也並非不可能，如「蹲」字就是一例（註二十）。雖然「蹲」字有版本證據，而這兩例沒有。再進一步探討，根據許氏說文引書的慣例，他是把左傳例稱為「春秋傳」而把國語例稱為「國語」或「春秋國語」的（註二十一）書中引公羊傳特別稱為「春秋公羊傳」，便是用以區別於左傳。這點含意段玉裁曾作多次闡論（註二十二）。只是有幾處如「邦」「年」「祿」等字，把春秋經文也稱為「春秋傳」。嚴可均說文校議以為當刪「傳」字（見「邦」字條），而段注則以為「凡說文引春秋經，皆繫諸傳」。這話雖不盡然（註二十三），但當有可能。因為許慎是尊古文的。說文序末說：「其偁易，孟氏。書，孔氏。……春秋，左氏……皆古文也。」所以王筠說文

註十七：「焞」字「春秋傳曰」下段註：「傳當作國語」。

註十八：說文「蹲」下所引春秋傳「蹲本肇末」為國語齊語文。但是只有段註本作「春秋傳」，從宋本。他家皆作「春秋國語」。鉅樹玉段氏說文註訂說「按王氏宋本及五音韻譜、繫傳並作『國語』」；「忼」下所引春秋傳「忼歲而歠日」，雖然與左傳文字有「忼、覩」「歠、渴」之異，但與國語也有文句顛倒之別（國語作「忼日而歠歲」）。說文引書，文字每與今傳者有出入，不足爲奇。然說文學者，猶各執一端，爭論未已（柳榮宗說文引經考異、承培元說文引經證例可為代表）。此二例既有版本之異，文句之謬，自不宜與「焞」「榦」相提並論。

註十九：雷浚說文引經例辨：「當云春秋國語，不當云春秋傳……蓋轉寫之誤。」

註二十：參註十八。

註二十一：說文引春秋傳約一百六十次左右，除去有問題的不計，一百五十餘次都是指的左傳。又引國語約二十二次，除「焞」「榦」兩例稱「春秋傳」外，稱「國語」與「春秋國語」者大概各十次。雷浚說文引經例辨謂「闡」字條引「國語曰」少「春秋」二字，依全書通例當云「春秋國語」。不知作「國語」也是通例。

註二十二：見「邦」「年」「祿」「觀」諸字下段註。

註二十三：「忼」「穀」等字下引作「春秋」。

國語辨名

句讀發揮段注之義說：「言『傳』者，謂據左氏本，不據公羊、穀梁之經也。」比如「邦」字，左氏經文作「邦」，公羊作「詩」，便是證據。校議以爲當刪「傳」字，尚不明此義。春秋經外，另有一處把周禮之文稱爲「春秋傳」。那便是卷六木部的「褐」字條。顯然是許氏一時記憶或書寫之誤（繫傳已有此說）。從這種情形看來，第三種解釋的可能性也大大減小了。許書稱國語爲「春秋傳」，只是他一時纏混或後世傳寫之誤。因此「春秋傳」一名，（無論是鄭注或許書），不能算是「國語」的正式名稱。

「春秋傳」之外，還有把國語稱爲「左傳」的。爾雅釋天郭璞注說：

左傳曰：今又荐饑。

邢昺疏說：

此晉語文也。左丘明既作傳以解春秋，又采簡牘以作國語。其文不主於經，故謂之外傳。俱是丘明所作，亦得云左傳。

晉饑乞糴於秦一事，左傳與國語都有記載，其文大同小異。但這一句却只見於國語。很可能是郭璞記憶之誤。郭注引國語多數是作「國語」，也間有作「外傳」的，如爾雅釋言二郭注：

外傳曰：枕由以塙。

外傳曰：已復於事而遂。

則此「左傳」也可能是「外傳」轉寫傳刻之誤。邢疏混同鹿馬，極力彌縫，未免可憐。此事順筆表過。

二

為什麼叫「國語」呢？韋昭序說是左丘明著左傳之後，因爲「雅思未盡」，所以：

復采前世穆王以來，下訖魯悼智伯之誅。邦國成敗，嘉言善語、陰陽律呂、天時人事、逆順之數以爲國語。

論衡案書篇則說：

左氏傳經，辭語尙略。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。

他們都談到左丘明撰國語的原因以及國語的內容。左丘明爲什麼要撰國語以及國語是

否左丘明所撰，是另一問題，我們這裡姑且不談。僅就國語的內容來說，論衡的說法，似乎較韋序爲得其要。因爲國語所包含的可以說百分之九十都是「嘉言善語」。那些「邦國成敗」「陰陽律呂」……不過是「嘉言善語」的內容或徵驗而已。從內容上再進一步推求，我們知道國語之所以得名，實在是因爲它是一本選錄的「辭語」的集子。再說得完善一點：因爲這部書是若干國家的嘉言善語的合錄，所以叫做「國語」。

爲什麼叫「春秋外傳」呢？韋昭序以爲左丘明既傳春秋，又撰國語。因爲國語「其文不主於經，故號曰外傳」。左傳與國語都是左丘明所作。左傳傳解經文，故叫作內傳。國語不解經，但與春秋及左傳又都有關係，故稱爲外傳。這雖然是韋序的意思，但這種情形並不僅是國語如此。如公羊、穀梁都有外傳（註二十四）。韓詩也有內、外傳（註二十五）。這大概是漢以來的傳統說法。一直沿用到現在。不過，也有人不這麼解釋。劉熙釋名釋典藝以爲：

國語又名外傳。春秋以魯爲內，以諸國爲外。外國所傳之事也。

這種說法，是不能夠獲得學者們的贊同的。四庫提要說：

書中明有魯語而劉熙以爲外國所傳，尤爲舛迕。

董增齡國語正義推其說而衍之：

書中明有魯語而以爲外國所傳。且周語可以稱「外」乎？其說非也。

劉熙之外，司馬貞也有這樣的說法。史記吳太伯世家引賈逵曰：「外傳曰：吳先歎，晉亞之。」司馬貞索隱說：「外傳卽國語也。書有二名也。外吳者，吳夷，賤之不許同中國。故言外也。」顯然司馬貞以爲「外傳」一名，是專門用來稱呼國語書中的夷語部份的。這種說法，當然勉強。同屬一書而異名以爲褒貶，實在是奇怪的事。而且韋昭之解，網羅舊注。「因賈君之精實，采唐、虞之信善」。如果賈逵「外傳」一名，曾含此特殊之寓意，韋昭何以無一語爲之辨解說明？可知索隱實是曲解妄說，和釋名一樣，都是無稽的。我們查閱載籍，知道公羊、穀梁、韓詩都有「外傳」。實在可

註二十四：見漢書藝文志。今佚。

註二十五：史記儒林傳：「韓生推詩意，而爲內、外傳數萬言。」漢書藝文志有韓詩內傳四卷，外傳六卷。

內傳今佚。

國語辨名

作為推翻劉熙、司馬貞之說的有力證據。韓詩外傳猶存，它所載的豈是「外國所傳之事？」豈是「賤之不許同中國」？（註二十六）而且劉熙把「傳」字讀為平聲，也是很突兀的現象。突兀的現象並非不可能發生，但一定得有特別的解釋和充足的證據。望文生義是不行的。

三

上文已經說過，「國語」的名稱，較保守一點來說，也不會晚於魏安釐王時代。其實，我們如果上推，還可以找出它若干淵源來。墨子公孟篇說：

子亦聞夫魯語乎。魯有昆弟五人者，其父死，其長子嗜酒而不葬。其四弟曰：子與我葬，當為子沽酒。勸於善言而葬。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。四弟曰：吾末予子酒矣。子葬子父，我葬吾父。豈獨吾父哉！子不葬，則人將笑子。故勸子葬也。

如果公孟篇是戰國初年的作品，則「魯語」一名，早在戰國初期已經有了。不過，有一點要在這裡說明：公孟篇引這一段魯語，並不見於今本國語魯語。這種稗官小說式的題材也與國語的風格不一樣。今國語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完整無缺（太平御覽即錄有國語佚文多處），但從風格來看，與其說它是今國語的佚文，倒不如說與今國語原不相干反似得其真。還有一點牽涉到校刊方面的問題也附帶在此一提。便是「魯語」的「語」字，畢沅說意林引作「人」。如果原作「魯人」，這些推測便都成廢詞了。

墨子公孟篇之外，國語楚語上也有這樣的話語：

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，以戒勸其心。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，以休懼其動。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。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。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。教之令使訪物官。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。……

韋昭注「語」字說：

語，治國之善語。

我們可以這樣推想：大概當時很多國家都有他們的「語」。左傳哀公十三年孔穎達疏

註二十六：四庫提要說：「其書雜引古事古語，證以詩詞。與經義不相比附，故曰外傳。」

謂「國語之書，當國所記。」大概是不錯的。那些「語」，是紀錄的他們本國的大人先生或先賢哲的嘉言善語的集子。也許那些「語」的來源與記言的右史有關。但決非全部抄自右史。它是經過選擇與潤色的。這種集子，是用來作為他們的貴族子弟的教本的。那些國家的「語」集，大概就是後來國語的藍本。後來也許還加上了些家乘的材料。我們知道，當時卿大夫都有秉筆的家臣，如晉語九說：

（董安于）對曰：「方臣之少也，進，秉筆，贊爲名命。稱於前世，立義於諸侯。……」。

又說：

智伯曰：「何懼？」（士苗）對曰：「臣以秉筆事君。……」

這些秉筆的家臣，也許就是擔任記言記事的工作。日本漢學者秦鼎說：

秉筆，蓋左右史類（註二十七）

大概是不錯的。像晉語九：

趙簡子田于鱠。史黯聞之。

韋昭注說：

史黯晉大夫史墨，時爲簡子史。

簡子之史，大概也就是簡子的秉筆之臣。此例正足以補充秦鼎之說。正因爲卿大夫有史，所以像魯語敬姜的事，晉語范氏、趙氏的若干事，瑣屑而隱祕（註二十八），都很可能出自家乘。而紀語的體裁，在當時恐怕也是一種風尚。大家所熟知的如論語、如孔子家語都是（註二十九）。〔「家語」「國語」成爲一種引人深思的對照〕。東漢荀爽有漢語之作。（史記孝文紀集解尚引其書。）當然也是這種風尚的綿延。把周王

註二十七：見國語定本。日本文化六年浪華書肆印文榮閣藏本。

註二十八：敬姜的事，如欲室文伯而賦詩，如文伯死而戒其妾哭、如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、如露堵父憤鼈之小諸事，皆瑣屑。范氏、趙氏的事如范文子暮退於朝（晉語五）、范文子祈死（晉語六）、趙文子冠（晉語六）諸事，皆隱祕不足爲外人道者。

註二十九：今本孔子家語雖可能是王肅或其弟子所偽，但它的名稱與體裁是淵源有目的。漢書藝文志即載有「孔子家語二十七卷」。文獻通考引孔安國後序說：「孔子家語者，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詢相對問言語也。」

國語辨名

朝的、魯國的、齊國的、晉國的……若干國家的「語」編在一起，加以潤色（註三十），而冠以「國語」的總名，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。

註三十：崔述說：國語主於數言，非紀事之書。故以「語」名其書。而政事多不載焉。然其言亦非當日之言，乃後人取當日諫君料事之詞衍之者（轉引自史記會註考證周本紀考證）。